

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为例

胡 艳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 要

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 林语堂的英译本*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为其经典译本。本文运用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 从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出发, 逐步分析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过程, 考察其译者主体性在阐释运作各环节中的具体体现。研究发现, 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呈现为一种“协调性创造”, 信任阶段以情感共鸣与文化使命共构文本价值, 侵入阶段对传统伦理概念进行现代过滤, 吸收阶段重塑汉语散文节奏并策略性移植文化意象, 补偿阶段则通过隐性增补、语境铺垫与诗意再造修复阐释过程中的能量流失。这一过程性分析揭示了林语堂在忠实与再创造之间达成的动态平衡, 为阐释学翻译理论在中国古典散文英译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个案参照。

关键词

乔治·斯坦纳, 阐释学翻译理论, 译者主体性, 林语堂, 《浮生六记》

A Study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rge Steiner's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Lin Yuta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Yan Hu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Abstract

The autobiographical prose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a literatus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nd Lin Yutang's English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regarded as its classic version. This paper employs George Steiner's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oceeding from the four steps of trust, aggression, incorporation, and restitution,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Lin Yutang's English rendering step by step, examining how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s concretely manifested in each phase of the hermeneutic mo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Lin Yutang'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presents itself as a kind of "coordinated creativity": in the stage of trust, he co-constructs the text's value through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cultural mission; in aggression, he applies a modern filter to traditional ethical concepts; in incorporation, he reshapes the rhythm of Chinese prose and strategically transplants cultural imagery; and in restitution, he repairs the loss of hermeneutic energy through implicit supplementation, contextual grounding, and poetic recreation. This process-oriented analysis reveals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that Lin Yutang achieves between fidelity and re-creation, thereby providing a cas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Keywords

George Steiner,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Lin Yuta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所著的自传体散文，细腻呈现了一对普通文人夫妇在清贫中经营诗意、于日常中寄托性灵的生活图景。作品语言质朴清新，富有诗意，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精髓融于一蔬一饭、一器一物之间，被后世誉为“性灵文学”的代表之作。林语堂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认为其展现了中国人最富人情味的生活理想，并于1939年将其译为英文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该译本出版后，不仅奠定了《浮生六记》在英语世界的地位，更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美学的重要窗口。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构建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是一个极具研究意义的角度，本文将在此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浮生六记》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以期阐释学的实践运用和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and 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

阐释学(Hermeneutics)又名诠释学或解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1]。阐释活动起源于人们对《圣经》的阐释，经由施莱尔马赫和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等人的发展，阐释学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并由认识论转向为本体论。而阐释学与翻译的联系体现在“如何解释源语与译语之

间纯语言差距之外的文化和思维差异, 以及如何较为恰当地理解源语, 表达译语” [1]。乔治·斯坦纳研究并发现了阐释学和翻译之间具有相通之处, 并在《通天塔之后》一书中详细阐述了阐释学与翻译的特征与联系, 其核心观点是“理解即翻译”, 并提出了重要的“翻译四步骤” [2], 斯坦纳把翻译过程分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

乔治·斯坦纳认为信任是翻译的第一步, 是进行一切翻译活动的基础, 始于译者对译本的选择和信任。译者需要相信原文中的内容有价值、有意义, 才能基于这种信任进行后续的翻译活动[3]。侵入作为第二个步骤, 其作用至关重要。在翻译过程中, 由于译入语和译出语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两种语言, 译者在理解过程中势必会与源语文化产生冲突和碰撞, 正如斯坦纳认为翻译的过程是一种接近和挪用原文意义的行为, 从而导致在翻译时以译入语的角度对原文产生“进攻”行为[4]。吸收是在侵入的基础上进行的, “吸收”是指译者将原文内容打破并进行再解释和重构, 使用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形象来代替源语文本, 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5]。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需要将原文的意思和形式移植到译文中, 并进行融合和转化, 这一阶段是主体性施展最密集的环节。补偿是翻译的最后一步, 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斯坦纳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 侵入和吸收过程难免会造成原文含义的缺失; 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因此也无法避免地会造成原文与译文的不平衡。因此, “补偿”这一步骤便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and 改变, 以恢复原文所包含的信息与情感, 同时尽可能使译文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6]。

由此可见, 在斯坦纳的翻译理论中, 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均强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译者主观创造的重要性也从中得以体现, 这四个步骤并非线性推进, 而是相互渗透、循环回溯的, 译者主体性正是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动态力量。该框架为考察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中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契合的分析路径。

2.2. 译者主体性

在中国古代, 译者被称为“舌人”, 意为传递文字的人。由此不难发现译者在中国古代的地位相对较低。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 学者们认为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迁移, 而是一种文化交流。因此,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不能再被忽视了, 译者主体性应在翻译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7]。屠国元[8]基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 研究译者的主体性。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会误读文本, 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为这种误读提供了合理的支撑。杨洁[9]从理论层面深化和拓展了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强调了译者本身的主体结构对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并对译者主体结构及其相应功能进行了探讨。从他们的研究中不难看出, 译者主体性与翻译过程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译者主体性指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10]。在文学翻译中, 译者根据自身对原文的理解与双语掌握程度, 将作品转换为目标语并对其进行艺术性加工, 使其具有译者独特的翻译及语言风格, 从而彰显译者的主体性。但主体性也会受到一定因素的限制, 如原文的写作风格以及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译者需要在尊重原文写作风格与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运用自身翻译经验及不同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

3. 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在《浮生六记》英译本中的体现

3.1. 信任

在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中, 信任是翻译的首要前提。译者不仅要对原文抱有充分的信任, 也要对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语言转换能力有信心,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 以细腻的笔触

记述了他与妻子陈芸的日常琐事、文人雅趣及人生坎坷。作者以一种冲淡自然、真挚动人的文笔，描绘出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艺术和精神世界，虽然书中交织着生离死别的哀伤，却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超越苦难的闲适诗意与深挚真情。该作品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独树一帜，经林语堂英译后在西方世界亦广受青睐。译者林语堂出于对《浮生六记》的极度倾心，深切体悟到书中蕴含的中国生活哲学以及夫妇间的至情至性，从而坚信这部作品具有跨越文化的传播价值，对原文产生了深厚的信任。与此同时，林语堂学贯中西，对自己能用流畅地道的英语传达原文的神韵充满信心。正是这种对原作价值与自身能力的双重信任，使他最终选择将这部古典美文译介给西方读者。

3.2. 侵入

在译者对原文本建立信任之后，翻译便进行到了第二步“侵入”。在此环节中，译者不仅充当着读者的身份，自身对原著要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同时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文学才能，包括情感、审美、想象力等，才能将源语文本生动地传递给读者[11]。在此步骤中，译者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加入自身对原文的解读和分析，两种语言和思想发生冲突，这正是一种目标语对源语言的侵入。

例 1: (芸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曦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恐公婆疑其懒，故早起也。虽家无储蓄，而日食三餐，未尝或缺。

She was never known to lose her temper. When you talked to her, she only smiled. She was respectful to her superiors, and kind to those below her. Everything was kept in perfect order. She used to get up the moment the first rays of the morning sun fell on the window, as if somebody were calling and hurrying her...She said she was afraid people might think her lazy, so she got up early. Although the family was poor and without savings, we never missed our three meals.

这段译文看似忠实流畅，但将原文与译文并置细察，林语堂的“侵入”痕迹清晰可辨。原文“事上以敬，处下以和”是典型的儒家伦理话语，暗含严格的等级秩序意识。“上”与“下”并非简单的人际关系描述，而是嵌入宗法礼教框架中的伦常规定。林语堂将其译为“respectful to her superiors, and kind to those below her”，保留了上下之别，但“superiors”一词在现代英语语境中更偏向职场或机构中的从属关系，儒家伦理中那种基于血缘与宗法的道德义务感被悄然稀释。更为微妙的是，原文中“恐公婆疑其懒”被林语堂译为“she was afraid people might think her lazy”。“公婆”这一承载着中国家庭伦理权威的具体称谓，被替换为泛化的“people”。这一替换并非误译，而恰恰是“侵入”的典型表征。林语堂有意淡化孝道伦理中“事奉公婆”的强制性色彩，将芸娘的早起动机从道德约束转化为一种更易被西方读者理解的社会性顾虑。这种过滤使芸娘在译文中更接近一个温柔勤勉的普通妻子。林语堂的现代美学眼光在此悄然介入，他对传统伦理概念进行了“去重量化”处理，以便让芸娘的性格更顺畅地融入他所预设的“可爱女人”形象。

例 2: 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

We lived together with the respect of Liang Hung and his wife, and the longer we were together, the more passionately attached we became to each other.

“鸿案相庄”典出《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每次归家，妻子孟光将食案举至与眉毛齐平，不敢仰视，以示对丈夫的敬重，后世以“举案齐眉”喻夫妻相敬如宾。这一典故的核心语义是“以礼相待”，即夫妻之间恪守礼数、彼此尊重，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情感亲密。林语堂的译文处理颇为耐人寻味。他并未直接舍弃典故，而是将其译为“the respect of Liang Hung and his wife”，保留了文化专名的可辨识度；但紧随其后，他将原文的“情愈密”译为“the more passionately attached we became”，引入了“passionately”

这一在英语中具有热烈情感的副词。这一处理将原文中偏重礼仪秩序的“相敬”与偏重情感浓度的“情密”进行了语义上的重新配比：典故所携带的“礼”的庄严感被保留为一个文化符号，但句子真正的情感推力却落在了“*passionately attached*”这一极具西方浪漫主义色彩的表述上。林语堂的“侵入”在此表现为一种双重介入：他既以保留典故的方式承认了原文的文化殊异性，又以增添情感强度词汇的方式将沈复夫妇的婚姻关系悄悄拉向西方读者更易共鸣的“伴侣式婚姻”模板。这种介入并非对原文的背叛，而是译者以自身文化知识结构和情感预设为滤网，对原文意义进行的一次选择性穿透与重塑。

3.3. 吸收

吸收阶段是翻译实践过程中的输出或表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对原文的态度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吸收”是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译者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主要阶段。其核心是把原文的意义与风格吸收到译文中。译者需要从原文中提取信息，选取相对应的词汇，以译入语的形式表达出来，让译入语读者能够获得与原语读者同等的感受。

例3：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

That night, when I had accompanied the bride to the bridegroom's home and returned, it was already midnight. I felt hungry and asked for something to eat. A maid-servant brought me some dried dates. I found them too sweet. Yün secretly pulled my sleeve and I followed her to her room. There I found some warm congee and some dishes kept aside for me.

沈复这段原文是一组典型的汉语流水句，六次主语切换(送 - 返 - 索 - 进 - 嫌 - 牵 - 随 - 见 - 藏)被压缩在极为紧凑的语流中，各动作之间的逻辑关系隐而不显，全凭读者的语感去填补，这正是古典散文“意合”之美的集中体现。林语堂的译文处理充分展现了吸收阶段的主动介入。首先，他将原文一个长句切分为七个独立英文句子，每个句子都有明确的主语和谓语，通过“*when*”和“*and*”等连接词显示逻辑关系。其次，时间标记被锚定得更精确，“漏三下”被译为“*it was already midnight*”，以现代时间概念替换了古代的漏刻计时意象。林语堂在切分之后并未损失原文的动作连贯感，而是通过一系列紧凑的英文短句(“*I felt hungry...I found them too sweet...Yün secretly pulled my sleeve...*”)再造了一种轻快的叙事节奏，与沈复笔下少年男女之间那份含蓄而生动的亲密感形成共振。他还特意增补了“*and some dishes kept aside for me*”，以“*kept aside*”点出芸娘私藏食物的心意，使原文隐含的情感信息在英文中获得了显性表达。这一吸收过程，是林语堂将汉语“意合”美学转化英文“形合”句法的典型案例。他在不损伤叙事内核的前提下，以英语散文的节奏重新编排了原文的信息流，使译文通顺流畅。

例4：余笑曰：“卿非解人，何得徒慕其名。”芸曰：“此即所谓虽不善饮而喜人饮也。”

I laughed and said, “You don't understand wine; why do you simply adore its name?” “That's just it,” said Yün. “I am like the man who does not drink himself but loves to see others drink.”

此例的要点在于“解人”与“虽不善饮而喜人饮”的文化内涵如何被吸收进英语表达系统。“解人”在明清小品语境中并非简单的“懂行之人”，它兼指对某事有真切的体悟与鉴赏力的性情中人，带有浓重的文人圈层色彩。林语堂将其译为“*understand wine*”，以“*wine*”对应“酒”，本身就已有文化迁移的痕迹，中国的米酒与西方的葡萄酒在文化意涵上并不完全对等；而“*understand*”一词则绕开了“解人”中“解”字的哲学意蕴(魏晋以降“解”常通“悟”)，选择了英语中最朴素的认知动词。这种选择折射出吸收策略的权衡，即若加以繁复注释，势必打断人物对话的轻快节奏，因此林语堂以“语义缩减”为代价，换取了人物口吻的流畅自然。随后芸娘的回应，林语堂采用了结构性的释译策略。“虽不善饮而喜

人饮”是一句浓缩的对仗性表述，译为“the man who does not drink himself but loves to see others drink”，以“who...but...”的英语关系从句将原文的并列结构转化为一种定义式的解说，仿佛在译文内部为英语读者搭建了一座理解桥梁。尤为精妙的是“That’s just it”这一增译，它不是原文所有，却是英文口语中表示“正是此意”的自然回应，林语堂以此将芸娘的形象从古典闺秀悄然拉向一个带有机智幽默感的现代女性，这与他在信任阶段所预设的“最可爱”形象一脉相承。整个吸收过程展现出林语堂鲜明的策略意识。在文化概念难以完整移植处，他优先保护人物对话的生命力，以牺牲部分语义厚度为代价，换取译文可读性。这种选择本身就是译者主体性在吸收环节最深刻的体现。

3.4. 补偿

“补偿”作为翻译过程的最后一步，有着两层含义：一是从语言的角度，使原文语言、风格、句法、习语等不可译因素，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二是通过翻译增强原文文本的力量和影响[12]。也就是说，“补偿”实则担负着查漏补缺的重任。

例 5：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

That night the moon was beautiful. As we looked down at the creek, the ripples looked like silk. We sat together by the water window, with a light silk fan in our hands, and as we looked up at the sky, we saw the clouds sailing through the heavens, changing into a myriad of patterns.

此例表面看来是平顺的英译，但将“轻罗小扇”与“飞云过天”的译文与原文并置细察，便可发现林语堂在文内嵌入的隐性补偿。“轻罗小扇”四字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高度编码化的意象符号，中文读者一见这四个字，无需任何解释便能自动唤起文化上的情感共鸣。英语读者显然不具备这一互文储备，若直译为“a light silk fan”，则这一层积淀在文化记忆中的审美联想将全数流失。林语堂的补偿手法颇为微妙，他没有加注，却在同一句中通过“we sat together by the water window”的“together”和随后“云”“月”“水”意象的组合经营，营造出伴侣共处的静谧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以情境氛围填补了单个意象的文化联想空缺。更精妙的是，他以“sailing through the heavens”译“飞云过天”，“sailing”一词赋予云以从容、舒缓的动态，与沈复笔下月夜水窗的恬静意境高度契合。“sailing”并非“飞”的字面对应，却以英语读者可感知的意象再造了原文的美学效果。隐性补偿的核心是不中断阅读流，而通过对上下文语境的精心编织，使文化缺省在局部得到意境的替补。

例 6：人生碌碌，竞短争长，却不道荣枯有数，得失难量。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are nothing but a hustle and bustle, with people competing over short and long, forgetting that prosperity and decay have their appointed times, and that gain and loss are beyond our reckoning.

沈复此句是《浮生六记》中极具代表性的感慨之笔，将人生感悟凝练于四四对仗的骈偶句式之中，语调苍凉，兼具哲理沉思与抒情意味。林语堂在吸收这句时面临两难，若完全仿照原文的简短句式，英语难以承受同等密度的语义压缩；若悉数展开为解释性长句，则原文顿挫有致的格言气韵将丧失殆尽。他的补偿方案体现在节奏层面的精微调控上。首先，他以“nothing but”这一英语口语中表示“不过如此”的轻蔑口吻统领全句，还原了沈复原文中那种“看破”的苍凉调子。其次，他通过分号将原文切为两个节奏单元，并在各单元内部以“with...”“forgetting that...”“and that...”等语法手段层层叠加从句，使句子在英语的线性推进中获得了类似于原文的递进感。更为精妙的是，他在“prosperity and decay”与“gain and loss”两组概念中，刻意选用了平行名词短语结构，在句尾形成了一对轻微的排比收束，这在一定程度上以英语的音韵手段补偿了原文对仗所特有的美听效果。这便是美学层面的诗意补偿，即不是在信息

量上做加法，而是在节奏、音韵与语调上，努力在另一种语言中再造阅读原文时的审美体验。

4. 结语

本文以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为框架，围绕“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步骤，系统考察了林语堂英译本《浮生六记》中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征与运作逻辑。研究显示，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既非隐身的忠实，也非张扬的改写，而是一种“协调性创造”。初始信任源于译者与原文精神气质的深层共鸣，侵入表现为对传统伦理概念的现代过滤，吸收聚焦于汉语流水句的英文节奏重塑与文化意象的策略性移植，补偿则通过隐性增补、语境铺垫与诗意再造三重机制修复阐释能量的流失。斯坦纳四步骤框架的方法论价值在于，它将译者主体性从“归化或异化”的标签中解放出来，揭示其作为贯穿理解与表达全过程、各环节相互渗透的动态系统。林语堂的英译本表明，理想的文学外译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化语境的深度参与，既对原文美学有切身体悟，又能以目标语文学规范进行创造性再现。这种基于深刻理解与克制的协调性创造，为中国古典文学外译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实践范式。本文仅聚焦单一译本的个案研究，后续可引入其他译者的《浮生六记》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丰富阐释学翻译理论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探讨。

参考文献

- [1] 彭桂枝, 何世杰, 编著. 中外翻译史解读[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 [2] Steiner, G. (2013)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3rd Edition, Open Road Media.
- [3] 王泽康. 阐释理论指导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袁昌英译 *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dge* 为例[J]. 海外英语, 2023(20): 39-41.
- [4] 宋晓容. 阐释学视域下杨必《名利场》汉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J]. 今古文创, 2024(2): 107-109.
- [5] 张帆. 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研究概述[J]. 海外英语, 2024(19): 39-41.
- [6] 刘中阳, 彭潍坊. 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观分析《青木川》英文译本[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3, 7(19): 173-177.
- [7] 袁莉. 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26(3): 74-78.
- [8] 屠国元, 朱献珑.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J]. 中国翻译, 2003, 24(6): 8-14.
- [9] 杨洁. 论翻译创造的内在理据: 译者的主体结构及其功能[J]. 外国语文, 2014, 30(2): 129-133.
- [10]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1): 21-26.
- [11] 徐国祥. 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以李继宏译《追风筝的人》为例[J]. 今古文创, 2023(40): 108-110.
- [12]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